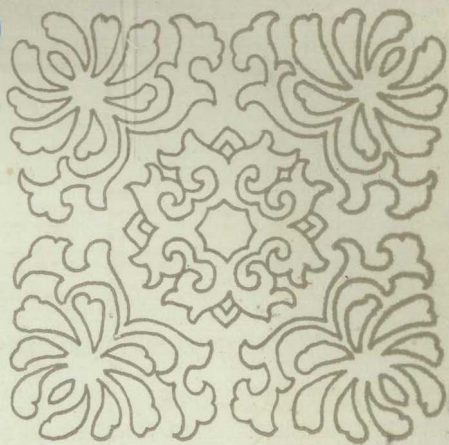


075539



谭兴国 著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BAJIN DE SHENGPING HE CHUANGZUO



四川人民出版社

43.495
T18.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谭兴国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蓓

摄影：李 舒

封面设计：文小牛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375插页5字数200千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100册

书号：10118·361

定价：0.95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童年时代	(9)
第三章	成长与觉醒	(25)
第四章	漂泊 探索 尝试	(41)
第五章	“把年轻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	(69)
第六章	《家》——反封建家长 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	(111)
第七章	在“最黑暗的年代”里	(130)
第八章	在抗日救亡战争中	(156)
第九章	黎明前的寒夜	(197)
第十章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212)
第十一章	在新的长征路上	(240)
附录一	巴金笔名索引	(247)
附录二	巴金著译年表	(249)
附录三	关于巴金创作评论资料索引	(277)
后 记		(287)

第一章 绪 论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勤劳的人民。我们的祖先曾经以其杰出的发明创造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思想成果，丰富了世界科学文化宝库，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是，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残酷的封建压迫，窒息着人民的创造精神，使我们不仅在科学技术、在生产力方面落在了世界先进国家的后面，就在文化艺术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叶我国的“五四”运动，象狂飚般席卷祖国大地，唤醒了我们民族和人民。这是发生在世界东方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古老国度里的文艺复兴运动，它高举着“科学”“民主”的大旗，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把我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五四”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旗帜的，文学艺术是其中重要的一翼。它锻炼了、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以及巴金、曹禺、老舍、沈从

文、丁玲、柔石、叶紫、殷夫、艾青、张天翼、沙汀、艾芜……等等，他们象灿烂的群星，撒布在祖国天空，成了黑暗中国照彻大地的一盏盏明灯。

巴金是五四以来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

他是一位异常勤奋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解放前，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写长篇小说《灭亡》到一九四七年中止创作的二十年内，他写了长、中篇小说二十部，计有“革命三部曲”《灭亡》《死去的太阳》《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火》，还有《海底梦》《春天里的秋天》《利娜》《砂丁》《雪》《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写了十一本短篇小说集近百个短篇，计有《复仇集》《光明集》《电椅集》《将军集》《抹布集》《沉默集》《沉落集》《神·鬼·人》《发的故事》《还魂草》《小人小事》和一本童话故事《长生塔》；写了近二十本散文、杂文、评论集，计有《忆》^①《短简》^②《生之忏悔》《点滴》《梦与醉》《控诉》《无题》《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静夜的悲剧》《海行杂记》^③《旅途随笔》《旅途通讯》《旅途杂记》等。巴金还是我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辛勤的园丁，他担任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主编过《文学丛书》《文化生活丛

① 一九三四年上海第一出版社曾以《巴金自传》名出版，巴金旅日归来后才见着，他不满意，收回重新修改，改名《忆》。

② 《短简》集一九五九年出版文集时，巴金将回忆性的文字抽出作《短简》（一），其余作《短简》（二）。

③ 一九三五年上海新中国书店初版名《海行》，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重版，改名《海行杂记》。

书》《译文丛书》，并和茅盾、靳以等编辑过《呐喊》《烽火》《文丛》等刊物，扶植了不少进步作家的创作，介绍过许多中外名著。

解放后，巴金精力充沛地继续从事创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写了上百篇短篇小说、特写、通讯、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出了十多种集子，其中重要的有《大欢乐的日子》《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生活在英雄的中间》《新声集》《友谊集》《赞歌集》《李大海》《倾吐不尽的感情》《贤良桥畔》，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巴金近作》（一、二）《探索与回忆》等。“文化大革命”前他被选为历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后，他又是第五届人大代表，并被选为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积极参预国家大事。他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理事，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主编过大型文艺刊物《收获》，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多次出国访问，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为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

巴金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解放前后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如《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父与子》《处女地》，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往事与深思》（现名《往事与随想》），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我的自传》，薇娜·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迟开的蔷薇》（德，斯托姆），《前夜》（波，廖托夫），《秋天里的春天》（匈，尤利·巴基著，据世界语翻译），《快乐王子集》（英，王尔德），《骷髅的跳舞》（日，秋田雨雀），《狱中记》（美，柏克曼），《西班牙

牙的血》（画册，西，加斯特劳绘）等等。

巴金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他“是‘五四’的产儿”。“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哺育了巴金。巴金创作伊始便旗帜鲜明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和一切违反正义的、束缚人的自由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不合理制度。巴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是一个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他憎恨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无论是封建制度或是资本主义制度）。他热爱人民，同情人民，为弱小者呼吁，替受难者申冤，把助力给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旧中国一部分下层人民的、尤其是青年的痛苦和挣扎，希望和追求。他是一代知识青年的良心。当然，解放前，巴金的社会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他反封建，但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鼓吹“社会革命”，却找不到实现这种革命的有效办法；他追求光明，但这“光明”却是朦胧的、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巴金是属于青年的，他的成功和不足，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属于青年的，因此，他在当时广大知识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所发生的广泛的影响，是很少有人可以赶得上的。尽管他没有给青年指出明确的出路，但他总是反复地大声疾呼，要反抗，要斗争，要革命，青春是美丽的，光明就在前头，未来属于我们，他推动了许多青年走上革命的征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金用他的作品，帮助了中国的革命。

巴金从事文艺活动的时候，正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革命作家团结在以鲁迅为首的“左联”周围，

在党的领导下，一面抗击反动统治者的血腥迫害，一面同各个反动阶级的文学代理人进行尖锐的斗争，粉碎了封建买办文学和法西斯文学，驳倒了“新月派”、“第三种人”等资产阶级文学派别的种种谬论，使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成了黑暗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巴金没有参加“左联”，他独立作战，但和一些进步作家保持着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反抗不合理的现有制度和追求一个平等自由的新社会的努力上，他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在创作思想上，他和封建复旧派，“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派别是对立的。他坚持把创作作为攻击不合理制度的武器和追求光明的呼号。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巴金更加靠近以鲁迅为首的党内外进步作家，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敌文协的许多活动，成了党在国统区的一位可靠的朋友。新中国成立以来，巴金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践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巴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一个富于深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忠实地生活”，“爱人”，“帮助人”，这是他一生的信条。也许人们可以责备他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对生活的本来面貌看得不准，对生活的本质挖得不深，但是你不能说他不忠实于生活，因为，他总是按照自己所了解的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描写，说着自己心里的话，他决不违背自己的信念去歪曲生活。有时候，他的某些作品似乎过分阴冷，他的主人公老是矛盾、挣扎、痛苦、唉声叹气，象一个躺在床上的病人，老是重复着自己的诉苦，却一事不做地等待死亡，象《激

流三部曲》的高觉新，《寒夜》里的汪文宣，象《小人小事》中那些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但是，作家火样的激情仍然贯穿在作品之中，他和人物一道受苦，一道挣扎，他大声疾呼：这里是悬崖，这里是深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巴金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某些个人。这增强了他作品的普遍意义。他不是同情某个人，为某个人呼冤，而是为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苦难悲愤。他不是攻击某些个人的凶残、不义，而是揭露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础——社会制度。

巴金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之一。他有我国古典文学修养，又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他受到了俄国十九世纪一些作家的影响，特别受到了俄国十九世纪革命者传记的影响，形成了他炽热、流畅、抒情的散文风格。巴金曾经提到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谈赫尔岑著作的一段话：“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象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①。这段话用在巴金身上正好。巴金象一团火，燃烧自己也使别人燃烧。巴金是一个热情、敏感、极富同情心的人，他把人间的苦难都装在自己的心里，自己也同样受苦。他的创作，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爱憎的倾吐；语言真切自然，生动活泼，一泻千里。在前期小说创作上，叙述多于描写，热情胜过理智，无论用一人称或三人称，都好似作者在那里说话，读多了就稍嫌单调。后期小说就较注意描写，让生活本身说话，显得深沉一些了。巴金善于抒发人物内心的感情，他写人物，着重人物

① 《往事与深思》（选译）前面的简介，见《巴金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103页。

的感情世界，从人物的感情去表现人物的性格。他不太注意人物外形的刻画，也很少大段的风景和环境的描写，写环境也往往为着烘托人物的内心感情。

解放后，对巴金的创作开展过热烈的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他的作品影响之大，也说明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成就和不足都如此引人注目，随着广大读者文化思想水平的提高，对其缺点和不足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在讨论过程中，那种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倾向，那种简单、粗暴、动辄打棍子的不良作风，非常严重，“四人帮”横行之时，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如何用马列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巴金的创作和他走过的创作道路，还是一个有待努力的课题。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帮助广大读者正确地阅读巴金的作品，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另一方面，学习这位老作家丰富的创作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作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从作家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他的生活和创作道理，他的世界观和个性特点等等）。离开作家所处客观条件的具体性，离开作家主观条件的可能性，用今天的观点去要求作家“应当如此，不应当如此”，即便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把作品的客观效果作为检验作品成效的唯一标准。这种客观效果包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效果和今天条件下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只能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只能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只能是正常人的而不能是不正常人的。对这种效果也必须作实事求是的估计，过分

的夸大或缩小都不恰当。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发生不同的影响。这既有作品本身的因素，也有环境和读者自己的因素。有的人读了《红楼梦》，产生“看破红尘”的思想，这不该曹雪芹负责；有的人读了《家》《春》《秋》，“悲观失望，失去斗争的勇气”^①，更不该巴金负责，因为巴金正好是反对悲观失望的。评论工作的简单化表现之一是：为了捧一部作品，便夸大其好的效果，似乎读了这部作品就革命了；为了否定一部作品，又夸大它的消极作用，似乎读了它就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了。不承认文艺作品对人有很大影响是不对的，把某一部作品的影响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也是不对的。

实事求是，要求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搞两点论，重点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在于从总的倾向看，哪个方面占主导地位，对一个作家的评论如是，对一个作家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的评论也当如是。这是我们论述巴金创作时力求遵循的方法。

当然，实事求是是一门既简单又复杂的学问，需要在充分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办到的。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正在恢复我们党的光荣传统，现在有可能对巴金和他的创作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评价了。

^① 见《巴金创作评论》126页，北师大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

第二章 童年时代

(一九〇四——一九一九年)

(一)

清朝末年的成都，一个腐朽、没落形将崩溃的封建王朝的缩影。那时，总督部堂的衙门虽然森严壁垒，日益多起来的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等官儿，也仍是轿马相随呼啸而过，但那威风已不似当年了。在居住满人的“少城公园”一带，经常会看见一些身着长袍马褂，拖着油污辫子的年轻人。他们手提雀笼，迈着八字步，往来于茶坊、酒店之间——这就是大清皇帝的子孙。他们靠着祖先造就的特殊地位，不劳而获，日嫖夜赌，荡尽家资，完全丧失了谋生本领，过着乞丐似的生活。

就凭这一点，一个异邦人也很容易判断，大清帝国的末日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随着八国联军的铁蹄踏上我们的国土，那些一手拿枪炮，一手拿十字架的传教士，也纷纷来到成都。他们用中国人民的“庚子赔款”办学堂、开医院、设教堂，送走一批一批的官费留学生，接来一批一批的洋货。他们的本意无非是培养几个买

办洋奴才，慢慢地来咀嚼中国这块肥肉。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思想也注入了中国社会的机体，资本主义的痼疾，在清王朝这具僵尸里蠢蠢蠕动起来。

“变法维新”象一阵旋风似的刮了过去，但新式官吏机构如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之类却设置起来；学校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讲授的内容除了“四书五经”“八股章奏”之类，也多少有了一点自然科学的课目。总之，旧时代的势力，新时代的影响，都在成都这个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

新时代的影响，“老成都”所熟悉的，莫过于所谓“娼场厂唱察”。所谓“娼”就是官娼，公开地卖淫，而政府就从出卖肉体的妓女身上榨取一笔血污钱，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抽花捐”；“场”是“劝业场”，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口修了一排二层楼的半西式街房，以便鼓励大家兴办“实业”，可“实业”终究没有办起来，倒成了推销洋货的所在地，因此，俏皮而求实的成都老百姓便把“劝”字改成了“商”，这就是巴金在“激流三部曲”里多次提到的“商业场”了；“厂”是“制革厂”；“唱”是官商合办的新式戏院“悦来茶园”，使川剧首次进入剧院演出；“察”是新式的警察，多半靠“花捐”供养。

显然，资本主义的因素正在成都慢慢发展着，而它一开始就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征。在这些学习西方老师的先进技术的活动中，真正够得上一番大事的，莫过于修川汉铁路的活动和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苦于蜀道之难的四川人对此莫不衷心拥护，民间凑集的资金很快有了，铁道学堂也开办起来，看样子四川人真要学洋先生的榜样，打通蜀道，来一个资本主义

的大发展！然而，事实的发展证明，帝国主义的先生们是不许学生学他的样的。他们出钱，清政府出面，来了一个“铁路国有政策”。四川人民的理想终于成了泡影。然而，这“保路”的风潮，却促进了大清王朝的覆灭。这是后话。在当时，修路的理想确实激动过许多有识之士的心的。

就在闹修路的这一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的主人公巴金在成都正通顺街李家公馆呱呱坠地了。他的出生，碰巧迎接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地处川西坝子中心的成都，是四川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剥削者和寄生虫的乐园。你如果沿着青石板马路往僻静的小街上一转，就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公馆”：牌坊式的门墙，一对石狮子卫兵似的蹲在黑漆大门的两旁，一道灰色的或赤色的高墙，把这家主人和喧闹的世界隔开；门墙内，有楼台亭阁，朱槛玉砌，有水榭花圃，珍禽异兽……，每一座公馆都象一座小小的“大观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它们的主人，有本地的或者外放各地的朝廷大员，有本地的也有近邻县分的大地主。这是他们享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繁衍子孙，教育下一代的地方。在这些“五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封建礼教是不易的法规，老一代是执法者，丫头、仆役、轿夫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就是年轻一代的主子们，也只能听命于老一代的主宰；至于中年一代，他们或者象《家》中的高克文高克明那样，读书做官，经商找钱，作新一代的剥削者，或者象克安克定那样，坐吃山空，当一辈子寄生虫。这些家庭，表面上冠冕堂皇，“世代书香”“诗礼传家”，

实际上，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叔姪之间，甚至父子、夫妇之间，都充满了无休止的争吵，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许多有为的青年被葬送在这坟墓一样的生活里；而一些人，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上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那付老样子。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这个社会机体内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使原始的封建结构逐渐解体，一天一天地半封建半殖民化。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这些大家庭，也一天天走向没落、崩溃。到了后来，这些大公馆差不多便都落入了那些靠着烟枪和钢枪起家的大军阀和新式官僚们的手里了，落进了做黄（金）白（米）黑（烟土）生意的豪商巨贾手里了。

巴金出生的李家，就正是这种情况。

（二）

李家原籍浙江嘉兴，什么时候迁来四川，我们没有去作考查。

巴金出世的时候，正是这个家庭最兴旺的时候。他曾写道：“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仆人。”^①那时候是他的祖父当家。

祖父名叫李金庸，号皖云，曾在清政府做过多年官，巴金出世前已经“告归林下”。由于他的“精明能干”，找了一大

^① 《短简》（一）：《我的幼年》。见《巴金文集》第十卷112页。

笔钱，买了许多田，修了大公馆，成了那一带屈指可数的大富人。他又是一个诗人，自己刻印过一本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喜欢接交“名士”，收藏古玩字画，和戏班子也有往来。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在他的晚年，一心想的是“五世同堂”，使这个大家庭一代一代永远兴旺发达下去。他受到一家人的尊敬，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了解和爱戴。在他临死前几年，看到不争气的“败家子弟”对他的欺骗，儿子们之间那种互不相容的仇视，似乎他已预感到这个家庭的崩溃了。他是在发狂中死去的。他一死，这个大家庭不久便溃散了。

在巴金的印象中，祖父是一个既保守又顽固的老人，他惋惜清朝的覆灭，他对子孙坚持着守旧的教育方法。他什么都自己说了算，俨然是专制制度的化身。他在临死前半年突然对巴金亲近起来，这很可能和他对早先的爱儿老五的失望有关系。他死于一九二〇年年初。巴金从来没爱过他的祖父，但对他的死却有些悲怜。《家》中的高老太爷就是写他，只不过把他死的时间稍稍移后了一点。

巴金的父亲是老大。二叔在清朝中过举，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装上假辫子，在成都开办律师事务所，做了大律师。巴金对二叔并不亲近，二叔也只在他父亲死后才开始关心巴金，给他讲解《春秋左传》。这个留过学又做律师的人在家里却是严守封建礼教，道貌岸然的。给女儿缠脚是他同意的，让巴金的大嫂迁出城外生产以避“血光之灾”，也是他同意的。《家》中的克明，就是以他的二叔为模特儿写出来的。

巴金的三叔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当过南充知县，辛亥革